

## 科學宗教及其他

武光東

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先生於三月十日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「『賽先生』造成的偏差」一文（以下簡稱「賽」文），兩個月後同一副刊分五天連載了旅美學人祝威仁先生批評「賽」文的大作：『神、宇宙、及「拿證據來！」』韓先生不僅把有關的文字拿給我看，同時把剪報貼在佈告欄裏，讓陽明所有的師生員工都有機會來比較這兩篇文字的觀點，能用點腦筋去思考這一個人生的大問題。韓先生對基督教的篤信與追求真理的熱誠是很令我感動的。從個人關係說，他是醫學院院長，我是教授，在建校的過程裏，在從事教育的努力中，我雖不敢說常常和他並肩作戰，但至少常常協助他流汗；觀念不一致的情形不是沒有，但他總是寬容我和其他同仁善意的批評，而我也總守着只求進言的本分，從不奢望自己的想法都能成爲學校的政策。但從比較韓、祝二先生的大作來說，我却不得不站在祝先生那一邊。以下我想

說說我的心態，我對科學和宗教的認識與看法。

首先，韓先生文章的題目就出了錯。「賽先生」是「科學」的代名詞，如說「賽先生」造成的偏差，等於說「科學」自己闖了禍。我讀韓先生的全文，他似乎並沒有譴責科學本身的意思，所要譴責的是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、持無神論的人挾科學以自重，是學科學的人出了問題，而科學無罪。這一點我相信沒有誤解韓先生的意思，因為他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科學家——一位醫生，一位生理學博士。他的專業訓練不可能使他憎恨科學，他先後擔任的職務（中原理工學院院長和陽明醫院院長）與推動科學發展全然脫不了關係。因此我不得不推論說，韓先生的文章命題有誤。

其次，我想說說我個人對於科學和宗教的經驗與看法。我是一個學遺傳學的人，遺傳學與進化論有不可分的關係。二十多年來，我一直在基督教的門前徘徊，始終無法登堂入室，原因是我缺乏良知的通行證，有幾道重要的關卡過不去。第一道關卡就是創造論與進化論的爭辯，我相信進化的過程是由簡而繁的，由無生到有生，由低等到高等，因此宇宙不是神創的，人也不是神創的，這就是基督教所謂的

無神論。既然如此，我為什麼還要在基督教的門前徘徊呢？我想引用胡適之先生的一段日記，來說明我徘徊的心態。一九一一年胡適之先生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，是年六月十三日先生參加中國基督教學生會夏令會，在他十八日的日記裏有如下一段：「下午紹唐爲余陳說耶教大義約三小時之久，余大爲所動。自今日爲始，余爲耶穌信徒矣。」在該日的附記裏，有一封寄許怡蓀的信，其中一段詳述他立志皈依基督教的情形：

「……方弟入中國公學時，有同學陳紹唐君（廣西人）與弟同班，一年之後，此君忽入守真堂專讀英文，後遂受洗爲耶教徒。他於前年來美，今於此相見。其人之言行，真如程朱學者，令人望而敬愛。其人信道之篤，真令人可驚。然其人之學問見識非不如吾輩也。此可見宗教之能變化氣質矣。」

最令胡先生感動的還是同信下面一段的描寫：

「昨日之夜，有Z. Ober 者，其人自言在大學時染有種種惡習（美國大學生之風俗有時真如地獄），無所不爲，其父遂歎棄之，逐之於外。後此人流落四方，貧不能自活，遂自投於河，適爲水上巡警所救，得不死，而遂之於一善堂。堂中人勸令奉耶教。從此此人大悔前行，遂力行善以自贖。救罪之後，一日有會集，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歷，有一報紙爲揭登其詞；其父於千里之外偶閱是報，知爲其子，遂自往覓之。既至知其果能改行，遂爲父子如初。此君現年成善士，知名於時。此君之父爲甚富之律師，其戚即美國前

任總統也。此君幼時育於白宮(總統之宮)，則所受教育不言可知，而卒至於此，一旦以宗教之力，乃舉一切教育所不能助，財產所不能助，家世所不能助，友朋所不能助，貧窮所不能助之惡德而一掃之，此其功力豈可言喻！方此君述其父再見其子時，抱之於懷而呼曰：My boy, My boy……予為墜淚，聽來亦無不墜淚。會終有七人起立，自願為耶教信徒，其一人即我也。」

這是一段很動人的文字，可以作為基督教所以能感動人心，所以能移風易俗的範例。一個人無論學科學與否，能有宗教信仰乃是他的福份，沒有人不願意修福份的。因為我知道門內有聖樂，有屬靈的喜悅，但只是我通不過關卡，只能在門外徘徊。在陽明醫學院，在我的周圍，有許多虔誠的基督徒朋友，其中少數比我年長，大多數比我年輕，我對他們敬愛如一。有許多年輕朋友，因為有信仰做動力，無論待人處事都散發着一股令人喜悅的光輝。

雖然我自己不能成為基督徒，但我尊敬而且鼓勵別人能有宗教的信仰。胡適先生也是如此。他在少年時候因一時感動而立志做基督徒，但幾年之後他就離宗教而遠去了。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他有一封致余耕葆女士的信很令人感動：

耕葆女士：

感謝你送我這本聖經的好意——把你拾到的寶貝送我的好意。我雖然不是基督徒，我一生很愛讀新舊

約全書，也常買這書的好本子送給青年的朋友。

我自己是一個不信神的人，但我感謝這個社會能容忍我不信神。所以我一生自律，我也應該容忍世間一切誠心信神的人，應該恭敬一切相信宗教的人。這是我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的一點微意。所以我感謝你贈我聖經的好意，……也相信你確曾得到信仰的益處，正如我認識的某些朋友確曾得到信仰的益處一樣。

胡適敬上

這是多麼澄明的見解！

事實上胡先生是從儒、法、道、釋和基督教的真義中昇華，而建立他自己無神的「社會不朽論」做他自己的宗教，他自訂的教旨是：『我這個現在的「小我」，對於那永遠不朽的「大我」的無窮過去，須負重大的責任；對於那永遠不朽的「大我」的無窮未來，也須負重大的責任。我須要時時想着，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「小我」，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「大我」的無窮過去，方才可以不遺棄那「大我」的無窮未來。』

綜觀胡先生的一生，雖沒有上帝的護持，他的言行和他的德業絕不會輸給任何一位基督徒，他是一位「賽先生」的擁護者，但「賽先生」並沒有在他身上造成偏

差。反過來看，有基督信仰的科學家與非科學家，在立身處事上，在行爲見解上，就敢保證不發生偏差嗎？因此我說：宗教可以讓那些凡人多做點自我反省，少帶幾分俗世的驕傲，少發生一些行爲的偏差，而世間只有那少數聖者，在沒有神和宗教的監臨下，也能做到不偏不差的境地。

什麼是科學呢？並不是原子論進化論才是科學。我們吃飯有吃飯的科學，走路有走路的科學。不依經驗，不照客觀的事實去走路就難免要走冤枉路；不按衛生的知識吃飯飲水就難免生病。因此按照科學行事是不會有偏差的，發生偏差的不是科學的本身，發生偏差的是人——科學家和非科學家，科學主義者與非科學主義者都一樣。宗教的任務在於幫助科學，使人能「人」得更圓滿。宗教的出路不是反對科學。我是一個騎牆派，正如梁啓超先生是騎牆派一樣。六十年前梁先生在他的「歐遊心影錄」裏就會對科學發出和韓先生類似的攻擊，他說：「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，到如今却叫起科學破產來。」不過梁先生又說：「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，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。」「人生問題，有大部分是可以——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。却有一小部分——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。」我的

認知是科學和宗教根本是兩碼子事。一個是才子，一個是佳人；一個是理智，一個是情感；一個是探索客觀事實，一個是追求主觀滿足。携手同行則兩蒙其利，齟齬反目則兩蒙其害。韓先生是一位科學家，也是一位業餘傳道人，如若從宗教的觀點來攻擊科學，就好像自己打自己，越打越不是。

正如祝先生所說，「賽」文所謂「一場筆戰的後遺症」是不正確的。從史實說，科學玄學論戰發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前後，參戰的主將是張君勱和丁在君，被間接拉入戰場擋砲火的有梁啓超和吳稚暉，參戰的副將人士很多，因此半年多的時光裏竟產生了二十五萬字的戰蹟——即十二年十二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「科學與人生觀」。在交戰期間，胡適之先生在南方養病，只是看他的朋友們打得火熱，「忍不住心癢手癢」，在病中寫了一篇不到一千五百字的遊戲文章——「孫行者與張君勱」，和張先生開個玩笑；此後他一直隔岸觀火，直到戰事結束，在檢討戰果時才由他寫了一篇總評——「科學與人生觀序」，把所有參戰的人都數說了一頓，當然在文字裏對丁先生的偏愛是毫不掩飾的。因此韓先生說這場筆戰的結果，使「胡派」的看法也漸漸成爲思想界的主流。「這「胡派」二字全爲莫須有。胡氏一生的貢

獻是文學改革，是白話文，是實驗的精神，是對民主自由的提倡。如果說幾十年來科學的人生觀已成為思想的主流，實既非胡氏之罪，亦非胡氏之功，乃時代之產物耳。

最後，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是相當幸運的。在我們的歷史上，學術思想受宗教信仰迫害的例子很少。我們現在立國的憲法更明定信仰自由。我很盼望在我們的社會裏，要繼續維持宗教不干預政治，宗教不干預教育的傳統。政治領袖和教育家有無宗教信仰悉聽尊便。古語說「有容乃大」，我們必須要時存容忍之心，各信其所信；各神其所神。同時信教者要慎防偽善之士，利用宗教做追逐名利的階梯，最近長老會的紛爭可做殷鑑。宗教的排他性越強，流弊也越大。設若現今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天主教徒，將會馬上開人口政策的倒車，因為節育和墮胎都不是教皇所允許的。又設若我們的教育內容全由基督徒來制定，那我們大中小學的課程勢必改頭換面，把進化論的部分刪去而代之以創造論，這些都不是我們所願見的。

謹以上述淺見就教於院長韓先生，也歡迎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指正。

（原載六十七年六月「大學雜誌」）